



大陸修院的近況與前瞻

湯漢著

導言

天主教傳教事業在中國展開之初，即不斷努力在國籍人士身上推行聖召培育。但至一九二四年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才在中國宗座代表剛恆毅主教的推動下，訂定整體計劃，議決在全國建立十四間區域性總修院。至一九四九年，全國共有十六間總修院及不少地方性的大小修院。根據黎培理公使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全國主教書中，對中國一九四九與一九五零年預修院、小修院與大修院或總修院人數比較如下（註一）：

年份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零年
預備生	一三一一	一二五七
小修生	一八八七	一七三零
大修生	九零八	七二三
總數	四一零六	三七一零

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很多修院都陸續關閉，小部份修生離國出外就讀。至一九五五年，除香港華南總修院能繼續至今，以及兩湖總修院搬離大陸後仍能續辦一段短時日外，中國修院無一能繼續推持，且相繼被政府接管，用作其他用途。

自七零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重掌政權，推行四個現代化。為了種種現實原因，中共政府對待宗教採取較大容忍態度，也給予較大活動空間，於是在文革期間完全沉寂或轉入地下的宗教活動，又開始復甦。一九八零年五月廿三日至六月二日，在全國宗教事務局指導下，大陸召開了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及天主教代表會議。除修訂愛國會章程外，還增設推動牧民的「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中國主教團」兩組織，選出領導成員，並於六月二日通過籌辦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的決議：

「為了宣揚耶穌基督福音，繼承宗徒傳教事業，適應中國聖教會的需要，培養傳教司鐸和神哲學專業人材，會議決定開辦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并責成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籌辦。」（註二）由於國內神父只剩下



約一千位，平均年齡超過七十，因此，培育接班人成了目前教會的第一優先任務。自一九八零年至今，除未知數目的「靜默修院」外，有約廿間的大小「公開修院」在大陸先後成立。本文嘗試介紹這些八零年代才開始成立的修院的培育實況，以及反省一下這些修院培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大陸修院的培育實況

自八零年至今陸續開辦的大陸修院，按其性質區分，有兩大類：「靜默修院」及「公開修院」。

「靜默修院」的成立早於公開修院。由於靜默修院的隱密性，外間對它的具體情況所知甚少。然而，肯定它們與兩位重要的教會領袖人物有關，就是河北省保定教區的范學淹主教及陝西省鳳翔教區的周維道主教。

據聞，在五十年代中共推動成立愛國會之初，有些神職人士和教友領袖採取了妥協態度；但妥協後，共黨政府還施加壓力。因此，有些神職人士和教友覺得必須站穩，而教友們也敬佩他們。范主教屬於這類人士，且被稱為「地下教會」的創辦人。他於五零年代被捕，判囚十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才獲釋。獲釋後，他自動按情況需要而培育神職人員，祝聖神父，甚至祝聖主教。當時，范的好友周維道主教寫信給他，勸他在未得教宗准許前不要進行。范回答說，在這個特殊情形下，教會法律本身賦予這個權柄。這件事情的發生慢慢流傳至國外，當然也包括流傳至羅馬宗座，聖座沒有指為不對。自此，「地下教會」的祝聖主教及有關神職人士的培育和活動便告展開，而范主教亦於三年後再度被捕，「罪名」是私自祝聖神職人士及與外國聯繫，判刑廿年，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才獲假釋。在范主教第二次坐監前後，很多培訓小組先後成立，俾能產生新一代的神職人士。這類修院在中國北方較為普遍，他們不容於政府，常冒被關閉或解散的危險。他們沒有固定的場所，也沒有具體的課程表，修業年期由二至三年，以至五、六年不等。但是，據說由這些修院培訓出來的神父已接近二百人。

亦聞說，這些靜默修院培育出來的神父雖能承擔牧民工作，但由於他們難與外間教會接觸，故易陷入偏頗的主觀宗教虔誠中，不但產生濫升聖職的跡象，也予不法之徒借

機混入其中，冒充地下神父，騙取教民金錢。

政府曾對這些修院施加壓力。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九日晚間，河北省保定教區橋寨村莊一所靜默修院遭到公安人員的搜索和關閉，約有四十位修生和兩位神父被逮捕，稍後陸續獲釋。這所修院在一座私人住宅中開辦了大約一年。（註三）此外，七十高齡的靜默修院院長劉書和「地下主教」亦曾於一九八八年十月被公安人員拘捕，至八九年一月十六日才獲釋，但在一段時期內不准會見任何人。（註四）

「公開修院」所指的範圍相當寬闊，主要是那些在政府批准下成立、接受政府資助的修院，亦包括那些政府知道他們的存在後，對他們既不給予資助，也不加以干預的修院。第一所是一九八二年十月開辦的上海佘山修院。目前，這樣的修院已超過二十間。按所招修生的來源範圍來區分，這些修院可分為四大級：（一）全國級神哲學院，只有一所，座落北京西城區柳蔭街十四號；（二）區域級修院，共六所，即：為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而設的沈陽神學院，為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五省而設的西安修院，為上海、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六省一市而設的佘山修院，為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五省而設的武昌中南神哲學院，為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而設的成都四川神哲學院，為北京及天津兩市而設的北京修院；（三）省級修院，例如：山東濟南聖神修院，山西太原圪塹溝修院，河北石家莊修院，內蒙古呼和浩特修院；（四）教區級（大、小、備）修院，多屬教區自費開辦的，例如：獻縣、長春、大荔、周至、鳳翔、三原、洪洞、漢口、貴陽、昆明等地的修院。在上述修院中，有超過七百位

修生就讀。當然，還有一些神父在個別教堂中，以帶領徒弟的方式，給予少數有志修道的青年初步培育。最近並分別在上海、江蘇、福建、江西及浙江，開設了佘山修院分院，以培育文學班修生。

一般報考入修院的資格是：年滿十八歲有志獻身天主教事業的男女教友，高中畢業，或具同等文化水平，并得到家長同意和教區推薦。報名後還須經過筆試及面試選拔。

修院普遍以教會傳統的「三 S」（聖德 sanctitas、學問scientia、健康sanitas）作為修生培育的要求。強調傳統神修，時間表安排修生每天有大約兩小時進聖堂祈禱，包括早晚課、默想、彌撒、拜聖體及唸玫瑰經，另加神師訓話、每月及每年的長短退省。每週一般要上二十多節到三十節課，主修拉丁語、教理、聖經、士林神哲學、聖教法律、歷史及神修，同時也學習現代外語、世界史地、中國史地、語文、政治、音樂及宣道等。宗教科目由神父、主教授與，而一般文化科目則以特約方式聘請外間大學教授前來指導。由於神職教授年齡偏高，與外間隔閡三十多年，加以修生們欠缺課本和參考書，因此課程內容頗單薄不全；但這情況近年已有改進。

南中國一名主教在八九年七月表示，中國天主教修院培育不合時宜，並未能適應現時的社會現實。他說：目前國內的修院培育與一九五零年代沒有兩樣，以致青年修生在適應方面出現問題；修院規條太過嚴謹，修生犯了些微錯誤，亦會被開除；他自己的教區已有三分之二的修生中途退學或被開除，到目前還未有一人晉鐸；令教區人員及有志獻身修道生活的人氣餒的問題，還有修院不定期的招生制度及配額制度；一些學生雖然

符合入學資格，但所屬教區名額已滿，因而喪失了進入修院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教區卻有剩餘的學額；這些高中畢業生由於很易找到工作，特別是在沿海的城市，所以他們不會等候進入修院。他慨嘆這些寶貴的聖召因而白白浪費。他預測，現時中國的聖召熱潮未必可以長久維持，政府的每個家庭一個孩子政策終會是家長送兒子進入修院的障礙。（註五）

愛國會對這些公開修院的影響，因人因地因時而異。指愛國會人士純是政府工具，或指所有這些修院都受他們控制，這些說法有欠公允，未符合全面事實。

從與一些修生的具體接觸中，得發現他們有很深的信仰精神和很強烈願當神父的意欲，很多都是熱心老教友家庭出身。

礙於過往政府所訂下的政策，很多修院教授神父避免正面談及或講授教宗的首席權，有些教授神父則利用教會歷史去襯托出天主教與接受教宗首席權是不可分開的。比如：當他們講到東正教、基督教與我們天主教的基本區別時，首席權這個問題便水到渠成地出現，修生們聽了亦心中有數。

雖然進修院的修生素質參差不齊，也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和壓力，但在師生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難下，這些公開修院終於收到了成果，已先後產生了近兩百位年青有為的神父。

大陸修院培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大陸修院培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可說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且繫於三個仍在變動中的因素：中共政府宗教政策的動向，愛國會的演變，以及大陸修院培育在社會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

首先，談到中共政府宗教政策的動向，我們就必須深入了解現行憲法對一般宗教信仰自由的收放條文，以及中共政府為天主教所訂定的宗教政策。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六條有關宗教信仰的條文，比過往七五和七八年的憲法較為平衡，刪除了「有宣傳無神論自由」一詞，但憲法條文把「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活動」分開論列，指明國家只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卻又未界定什麼是「不正常的」及「正常的」宗教活動。此外，為了避免國外人士的「干預」和「影響」，中共政府為天主教所訂定的宗教政策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而與此政策相連貫的是不能宣認教宗的首席權柄，以及推行自選自聖主教。因此，很多教友不願意加入公開修院，甚至掉過來加入靜默修院。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政府頒發了三號文件《關於在新形勢下加強天主教工作的報告》，暗示在目前中梵關係從對抗轉向對話的新形勢下，准許大陸天主教徒「與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聯係」，可以承認教宗的首席權，為教宗祈禱，但仍須堅持自選自聖主教的做法。這三號文件也意味著把主教團置於愛國會之上。無疑，這份文件指出了中共政府對待天主教政策的新動向，較前進步，為公開修院帶來佳音。但由於此文件所指示的宗教措施，尚與全球各地天主教的信仰及組織有重大距離，未說明容許教宗有權選任主教，因此，我估計它難被靜默修院人士接受。

其次，愛國會於五零年代的成立，與當時中國由被殖民地主義或半殖民地主義侵略的國家過渡成為獨立的國家有關，亦與共黨政府欲透過新組織去領導教會有關。今天，一些愛國會成員亦承認以往做過錯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政府對待宗教採取較大

容忍的時期，有不少神職人士和教友，過往曾為了忠於信仰和教宗而坐監受苦，矢志不渝，不肯加入愛國會，而今天為了教會前途及照顧教友，卻願意重出工作，甚至肯在門外掛上「愛國會」招牌的教堂從事牧民服務。更有些為了教會前途，而改變措施，接受愛國會職位，但他們始終忠於自己的信仰和教宗，而教友們也看得出來，非常愛戴他們。因此，不少主教、神父和家長放心送年青人進入公開修院。最近政府已逐漸容許非愛國會神父在修院擔任教職。自一九八九年起，上海佘山修院亦獲政府准許陸續邀請國外神父到該院講授神學主要科目，每次為期一至數個月不等。這些都是逐步開放的好現象，也是向好的演變因素。

最後，論及大陸修院培育在中國社會發展所擔當的角色，若套用聖經的字眼，大約可用「司祭」和「先知」兩類角色去描繪。公開修院培育出來的神職人士，雖然不必加入愛國會亦可晉鐸，但基本上他們將被委派服務於公開聖堂，與愛國會人士合作。他們將扮演聖經中的「司祭」角色，願意被納入社會制度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照顧教友靈魂上的需要，領導教友熱心敬主愛人，施行聖事，舉行彌撒，在教堂內開設慕道班，亦在法律容許和政府領導人士的鼓勵下，辦點小型社會服務，分擔政府所當盡的責任，以爭取社會人士的好感。而靜默修院培育出來的神職人士則是扮演著聖經中的「先知」角色，他們不願意參加政府所制定的組織，敢就人權及宗教自由問題提出教會的立場，在制度之外扮演反對派的角色。這種爭取人權和宗教自由的過程肯定是緩慢而痛苦的，必會受到政府軟硬兼施、既柔和爭取又強力壓迫的對待。事實，上述的三號文件第四點就

指出：「把地下勢力的骨幹分子與受他們影響和控制的信徒群眾區別開來，通過耐心細緻的工作，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各地要密切注視地下勢力的動向，一旦發現問題，要在黨委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協調各部門的力量，及時妥善地加以處理。」這裡所說的地下勢力骨幹分子，當然包括靜默修院所培育出來的神職人士。經過北京「六·四」事件後，中共對待未經政府批准的活動會特別敏感，甚至採用強硬手法處理。因此，靜默修院本身將可能遭到強力對付，被指為「反革命活動」。無論如何，從文革這場夢魘甦醒過來的大多數中國人，老的一輩都寄望來生，而年青一輩亦在尋求人生的最終意義，造成很多人都自動跑來教堂或接觸神父求學道理、領洗入教，因此，公開修院和靜默修院培養出來的神職人員勢必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供不應求的精神支柱。

展望

前景如何？我個人對它抱審慎樂觀的態度。

中共政府對宗教的政策和態度，自北京「六·四」事件後，雖未出現任何實際上的改變，但由於年邁的鄧小平尚未有確定接班人，因此，大陸短期內可能會有緊張局面出現，亦間接影響到宗教。但是，隨著目前整個世界的「對話」潮流，中梵關係也開始從對抗邁向對話。中國政府既要對話，宗教政策從長遠看大概會更為開放。無論如何，聖神常與教會同在，祂必會使神職聖召的種籽超越任何人力的限制，繼續發芽滋長。

關於愛國會的演變，既然上述三號文件已暗示天主教架構改組，醞釀著把主教團置於愛國會之上，則我們不妨拭目以待，靜觀

聖神的推動。

大陸修院培育在社會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促使外間教會作出回應。梵二「司鐸之培育法令」指出：「在大修院中所施於修生的完整教育，應指向一個目標，即按照耶穌基督乃導師、司祭和牧者的標準，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牧人。」（第四號）這段話勾劃出今日修院培育的新趨勢，推動修院返本歸原，使神父的宣道、聖化及牧民職務都指向基督「牧人」角色，以愛心和開放態度與現代人交往，執行基督的救世使命。而這個基督「牧人」角色，最充份反映在初期教會的使徒身上，它要求具備下列三點要素，就是：希臘文的 *Didache*，意指「生命之道」，即耶穌基督的靈修道路；希臘文的 *Koinonia*，意指「共融」，即不但在組織上隸屬聖統，而且在信、望、愛上發揮教會內彼此分享和互相支持的精神；以及希臘文的 *Diakonia*，意即「服務」，「好使天主成為萬有之中的萬有」（格前十五．廿八）。透過多與外間交流，大陸修院培育所潛藏的「牧人」角色，必得以浮現，而目前所強調的「司祭」或「先知」角色，亦終必會調合於「牧人」角色中。

無可否認，中國教會是一個受過創傷的教會，互相傾軋和流言蜚語此起彼伏；要予以重整和治療這種愛創關係，殊非易事。若沒有基督徒作中間人，甘願背負彼此間的重擔，是不可能成就的。當甲與乙不睦時，解決的方法有三個：其中一方認錯，請求對方原諒；或被開罪的一方完全不計較過往；又或者是局外的第三者介入，代替其中一方承擔過失。這第三種慷慨承擔精神，有時確能感動不睦的雙方，達致最後和解。其實，這就是基督的道路；祂雖然無罪，卻為我們罪

人承擔了罪過，使我們能與天主重修舊好。這也是外間教會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目前，不少快將畢業的修生們正遇到晉鐸與否的抉擇問題。一位快要在一一所公開修院畢業的修生剖白說：「在這個問題上，我真是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愛國會的一切我都看不慣，我不願意在他們手裡被祝聖為神父，另一方面，我也不願意去找一個非愛國會的主教把我祝聖成為一個『地下神父』，因為這樣一個神父，不能公開地行聖事，不能公開地進行傳教工作。所以我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這樣就乾脆決定不做神父，那又違背了我的夙願，也許亦違背了天主的聖召……總之，我現在非常苦惱。」這些無辜年青修生的內心痛苦，豈不就是向教會呼籲彼此修好的吶喊嗎？我們深信，在遵循梵二的路線和聖神的指引下，主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祈求的合一，必會實現。屆時，大陸修院必會培養出一批優秀的神職接班人，牧養中國教會，使它成為「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教會憲章」第一號）。

附註

（註一）羅光主編，「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台南徵祥出版社，一九六七年，頁三五八。

（註二）《中國天主教》，北京，一九八零年第一期，頁五十二。

（註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香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註四）《Asia Focus》香港，第五卷，第九期，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頁四。

（註五）《天主教亞洲通訊社新聞》，香港，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頁三。